



劉炳森書 千字文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劉炳森書
千字文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炳森隶书千字文/刘炳森书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1998.9

ISBN 7-5008-2029-1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隶书-法帖-中国-当代 IV. J292.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字(98)第 09931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印 刷:	北方印刷厂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	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	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:	6.25
印 数:	1~5000 册
定 价:	13.80 元

说《千字文》

启功

以「天地玄黄」为起句的《千字文》，名头之大，应用之广，在成千累万的古文、古书中，能够胜过它的，大约是很很少的。只看它四字成句，平仄流畅，有韵易诵，没有重字（没有重复写法的字），全篇仅一千字，比《道德》五千言这本著名的「少字派」书还少着五分之四。它便利群众，启发童蒙。其功效明显，流传久远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？

在它流传千余年的历史中，发生过或说存在着不少问题。有的问题「人云亦云」，「习而不察」。有的虽经人推论，而未得要领，也就「以讹传讹」。

大约在三十年代初，法国的伯希和氏发表过一篇考订《千字文》的文章，冯承钧先生把它翻成汉文，题是《千字文考》，发表在《图书馆学季刊》第六卷第一期。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《千字文》的撰写过程，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，对所谓「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」进行辨伪，费了很多笔墨。这本《千字文》见于明代《郁冈斋帖》和清代《三希堂帖》、《壮陶阁帖》，近数年原卷出现，有影印本。这本《千字文》，首句是「二仪日月」，末句题「焉哉乎也」，中间全不成话。伯氏认为它是宋徽宗时人造的伪古物。其实书风还不够唐人，其为凭空捏造，望而可见，仔细考证，心力未免可惜。而其他有关《千字文》的问题，由于着力点不同，反倒未暇谈及。

我在五六岁时，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（所谓「三百千」）的时候，但我只念过《三字经》后就被授读别的书了。接触《千字文》实从习字临帖开始。既是一字字地临写，就发现了许多异文。如「敕」或「梁」，「玄」或「元」，「召」或「吕」，「树」或「竹」等等，不免发生哪个对、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。后来逐渐留心有关《千字文》问题的资料，随手摘记，又几经散失，只剩写在一本帖后的一些条。由于借书困难，一时无法再加查阅核对，就先初步写出这篇大纲性的小文。目的只是想说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。遗漏和错误，自知不少，诚恳希望读者惠予指教。

周兴嗣《千字文》的产生

在南朝梁、陈(五〇二—五八九年)这不到一百年中间,忽然有一股「千字文热」,产生过至少四本(只说撰文,不论写本)。

一、萧子范本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:「《千字文》一卷,萧子范撰;又一卷,周兴嗣撰。」又《梁书》三十五《萧子范传》:「南平王……使制《千字文》,其辞甚美,王命记室蔡莛注释之。」

二、周兴嗣本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紧次萧子范本之后,已见上文。又《梁书》四十九《周兴嗣传》:「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,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,及成俱奏,高祖用兴嗣所制者。自是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北伐檄》、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》,并使兴嗣为文。每奏,高祖称善。」又《隋书·经籍志》:「《千字文》一卷,梁给事郎周兴嗣撰。」

三、失名人撰萧子云注本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周兴嗣本后云:「又《千字文》一卷,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。」

四、失名人撰胡肃注本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萧子云注本后接书:「又《千字文》一卷,胡肃注。」

当时还有梁武帝撰的《千字诗》。《陈书》十八《沈众传》:「是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,众为之注解。」又《南史》五十七《沈约传》:「约孙众,……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,众为之注解。」记载这些为的是说明沈众的学识,而不是著录《千字诗》。看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著录中,都已没有《千字诗》,大约唐代已经亡失无存了。既称为诗,是几言的?其他都称文而不称诗,又为什么?我非常怀疑周兴嗣次韵,「次」的就是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「韵」,但这将永远是个「怀疑」而已(记得唐初某类书中曾引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零句,现已无暇详检,即使查出,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)。如果连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算上,当时这种千字成篇的作品,就有五本之多了。

以上各条资料中,最不好懂的是「次韵王羲之书千字」。这八个字可以作许多解释,事理上也有许多

可能。例如：

- 一、王羲之写过千个字的韵语，周兴嗣依韵和作；
- 二、王羲之有千个零字，周兴嗣把它编排成韵语；
- 三、周兴嗣撰了千字韵语，然后摹集王书把它写出，像怀仁集《圣教序》那样；
- 四、周兴嗣次某篇文的韵成为此文，用王体字写出，因而误传为王羲之书，等等。总之，这八个字，与现传智永写本对不上。智永本上有「敕」、「有「次韵」，没有提出「王羲之书」。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，则应写出「集」字，如唐人集王书、金人集柳（公权）书，以至集唐句、集杜句等等。问题在于周兴嗣撰、智永写本的《千文》究竟与王羲之书有关无关？次韵二字是编次成为韵文呢，还是依某些韵字顺序押成的呢？

『王羲之书』和『次韵』问题

我们知道，每个故事都是愈传愈热闹。枝叶由少而多，已是普遍规律。《千字文》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。除《梁书》外，还有较后的何延之《兰亭记》，载有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三。张彦远为宪宗、僖宗之间的人，何氏当在中唐之世。《兰亭记》说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七代孙，还说他：「克嗣良裘，精勤此艺，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。……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，浙东诸寺各施一本，今有存者，犹直钱数万。」不待详细交代，智永所临，当然是王羲之的字，那么智永所临《千字文》中的字样，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。

其次是此后的韦绚所撰《刘宾客嘉话录》：「《千字文》，梁周兴嗣编次，而有王右军书者，人皆不晓其始。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一片纸，杂碎无叙。武帝召兴嗣谓曰：『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』兴嗣一夕编次进上，须发皆白，而赏锡甚厚。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……」。

日本圣武天皇死后，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胜宝八年（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）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，记录的账簿，称为《东大寺献物账》。账内有一段记载：「书法廿卷，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（下注：「廿五行，黄纸，紫檀轴，绀绫褙，绮带。」以下各条俱如此式）。同羲之草书卷第二……同

羲之书卷第五十七(下注:「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,浅黄纸,紺绫褙,绮带,紫檀轴」)。

所谓「同」,指的是同为「撮(指彙撮)」本。这里已抛开了智永,直说撮自王羲之,而归入了王羲之名下。《兰亭记》在《法书要录》中,紧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纪年的《古迹记》后,则还应晚于《献物账》。但海外流传,耳治易多。略去智永,抬高声价,原是无足奇怪的。

可见王羲之这个角色在《千字文》故事中不但实有,而且曾霸占了「真草千字文」。于是《梁书》中那条矛盾,就被韦绚大肆弥缝,什么「为我韵之」、「编次进上」,把最费解的「次韵」二字,分别落到实处。但是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?矛盾之处,并未能由此弥缝便得解决。症结所在,实为「次韵」二字,还值得探索下去。

按清初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四《撚须寄·诗原》中引《稗史》云:

「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,曹景宗后至,诗韵已尽,沈约与以所余『竞、病』二字,景宗操笔而成。……初读此,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。偶阅《陈后主集》,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:『披钩赋咏,逐韵多少,次第而用。』座有江总、陆瑜、孔范三人,后主诏得『迕、格、白、易、夕、擲、斥、折、惜』字,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,曾不搀乱一字,乃知其说是先(此处疑脱『以』字)诗韵为钩(按即闾字),座客探钩,各据所得,循序赋之,正后世次韵格也。唐之次韵,起元微之、白乐天二公,自号元和体,古未有也,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,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,而非酬和先唱者,是小异耳。」

《稗史》不知谁撰,其他引《稗史》处有一条记正统间处州生员吟诗事,知其书为明人之作。所引《陈后主集》,张溥、冯维讷所辑本中已不见了。赵冀《陔余丛考》卷廿三《联句》条亦述此说,但未注出处。后承毅中先生见告赵翼所引出处,此从略。

至于「敕」,无疑是梁武帝所敕了。所次之韵,是按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韵呢,还是另选韵字令周兴嗣去次呢,就无法知道了。宋人杨亿的《文公谈苑》所说「敕」为「梁」字之误,则纯属臆测,毫无根据。又梁武帝的千字叫作诗,别人的都叫作文,为什么,也无法知道了。

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写本问题

周兴嗣编《千字文》既与王羲之写的字有关系,那么是先有文还是先有字?「王羲之书千字」倘若真

在撰文之前已有了，又何以那样巧，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复呢？梁武帝固然收藏过许多王羲之的法书，挑出不重复的，难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吗？其实现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重复的字，而实有不同写法的重字，也有「借字」。摘出如下：

「絜」与「潔」「雲」与「云」「崑」与「昆」「實」与「寔」

在古书中不同的地方，曾被两用，但它们之间并非截然不同或意义悬殊的两个字。像《易经》里的「无」字，即是「無」字。如引《易经》把「无咎」写成「無咎」，当然算不准确，但一般使用这二字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因此《千文》中上举的八个字，实际是不同写法的四个字，并不能算严格的不重复。又「银烛炜煌」的「炜」字，智永写本，真书作「玮」，草书才作「炜」。按「炜煌」的「炜」，应是「火」旁，不应是「玉」旁，而文中真书部分用了个借字，可见当时王书千字中，实缺少火旁的「炜」；也可看出所集的王字，是以真书为主，而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，所以真书借字，草书不借。

哪里来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？即使果真是殷铁石集拓，但拓字细细描摹，不能很快办到，梁武帝要周兴嗣撰《千文》，殷铁石立即能够拓出千字，那只是故事夸张。其实古代对名人法书实有平常编集单字的事，唐韦述《叙书录》（载在《法书要录》四）：「开元十六年五月，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真迹，总一百五十卷，付集贤院，令集字拓进。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，分赐诸王。后属车驾入都，却进真本，竟不果进集字。……其古本，亦有是梁隋官本者。」所谓「集字」，当是摹集单字，为了编成备查的「工具书」。宋人、清人编排汉隶单字，明人、清人又曾编排草字，清末人又曾编排楷书，都是查寻各字不同写法的工具书。开元中令集贤院拓进的「集字」，无疑即是这种性质的。又韦述总述唐代内府收藏许多件古代法书，谈到其中换有「梁隋官本」（所谓「官本」可能指官藏本，或官摹本）。唐代摹拓法书既承梁隋旧法，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开元时始创。令我不禁想到怀仁集王字的《圣教序》岂非就是得到这类集字呢？这次编集《千文》的活动，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书，也许即是编集单字工具书的开始。又古人写字并非为后人集字预先准备的，每字大小岂能一律相近，《圣教序》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，可见怀仁在放大缩小上作了手脚。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写本《千文》，无论是摹（指钩描）、是临（指按照字样仿写），每字大小相同，也必然是经过了加工手续的。怀仁加了工的《圣教序》既可被认为是王羲之书，那么智永加了工

的《千字文》被题为「拓王羲之书」也就不足奇怪了。临王书也罢，拓王书也罢，智永写本的周兴嗣《千字文》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写本、刻本和临本

一、智永墨迹本

流传下来的智永写本《千字文》，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，只见过西安碑林宋大观年间薛氏摹刻本，捶拓年久，风采俱颓。一九一二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（出版社名）影印行世，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，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。内藤氏考订认为这即是《东大寺献物账》中所谓「拓王羲之书」「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」那一卷（现在已改装成册），所考极其正确。但内藤氏也有被一个字困扰处，即是那个「拓」字。《献物账》上分明写着「拓」，自然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拓所成，而这本笔划，却又分明是直去直来地写成的。保险些，说它是「唐摹」，再保险些，说它「摹法已兼临写」。七十七年前，可资比较的材料发现还不多时，作此模棱两可之说，也实有可被理解处。

此后几年，上虞罗氏重印此本，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，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，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。从此时以至今日，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。

二、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

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，今藏巴黎，绢本，自「惟房」真书一行起至「乎也」止，真草共三十四行。尾题真书一行「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」，只有一个真书字和几个草书字与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别外，其余无一不似。在面对原本临写（不是影摹）的法书中，这已是极够忠实了。重要的是真书「玮」字草书「炜」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，使我真要喊出「一字千金」了！

三、宋薛嗣昌摹刻本

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，为宋大观三年薛嗣昌所刻，其中各字都与日本藏墨迹本相同，有些宋讳字缺末笔，则是刻石时所缺。只有「炜」字真书不作玉旁。或是薛氏所据底本上所改，或是薛氏自作聪明，在刻石时当做「明显错字」所改，于是也「不出校记」（在跋中也不加说明以表示他改了字）。薛氏摹刻有功，却又功不掩过！

四、南宋《群玉堂帖》刻残本

南宋韩侂胄刻的《阅古堂帖》被查抄入皇宫，改名为《群玉堂帖》。其中刻了一个残本，自「囊箱」真书起，至「乎也」止真草共四十二行，后有智永小字款，是否蛇足，可以不论。「炜」字是否玉旁，已记不得。字迹与日本藏墨迹本十分一致，只是略瘦些，这是刻拓本的常情。此本在张效彬先生家，浩劫中被掠入一大官家，今失所在，也没留下影本。法书海盜，自古而然，真令人欲焚笔砚！

五、宝墨轩刻本

日本藏墨迹本后有杨惺吾先生跋尾，提到「宝墨轩本」，其本有影印本，首题「宝墨轩藏帖」，下刻朱文「山阴张氏世珍」长方印，次行题「唐智永禅师书」。大约是明末不学的坊贾所刻，字迹较弱，中多缺字未刻，似由底本缺损。「炜」字作火旁。「律召」召字真书缺，草书仍是召字。此本书法未佳，也无考证。只因杨氏所曾提及，故为列出。

《千字文》各本中的异文问题

《千字文》在流传过程中，特别经过宋代，被「避讳」改字搞得七乱八糟。有的由于和讳字本字相同，有的由于是音近的「嫌名」，一律加以避改。或缺笔划，或用代字，那些字虽然很乱，但还有迹可寻。只有一个「召」字被改为「吕」，最不易解。

「律召」作「律吕」的写本，最早见于怀素小草书写本，卷尾题「贞元十五年」，如果这卷是真迹，则「召」字改「吕」，在晚唐就开始了。但在词义的关系上，毕竟不合。《千文》这里相对的两句是「闰余成岁，律召调阳」。按地球转行，古代阴历算法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总有余数，积累了，够一个月，放在年末，号称「闰月」。又古代以竹制各种「律管」，对应各时的节气。管里放入葭灰，据传说到了立春，阳气初升，这相应的一个律管里的灰就自己飞出（说见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）。这种引动的作用，叫作「召」。
《吕览》十七「以阳召阳，以阴召阴」。综合看来，「律」与「闰」对，是名称，是实字；「召」与「余」对，是说明作用的，是虚字。如果作「律吕」，则是平行的双词，与上句不能成对了。所以我总怀疑这个字也是宋人避讳「嫌名」而改的。宋代有一个祖先名叫「眇」，「眇」字从「兆」得声，与「召」音近又同部。唐代李贺家讳「晋肃」，他应进士科举，就有人以为他犯了讳。这种音近嫌名，无

理取闹，本没有实理可讲的。不管「朮」、「召」的音究竟有别无别，即使有别，在要避时，还是不许不改的。有人反问：如按宋讳之说，则怀素小草书《千文》又该怎讲 回答是：如宋讳是实，则怀素字即假；如怀素字是真，则召字是宋讳说就不能成立了。谨待高明学者来断判吧。

宋讳见于薛氏刻本中的有：

玄(缺末笔)讓、樹(缺末笔)贞(缺末笔)敬(缺末笔，后又被人补刻上，宋拓本缺笔)匡(缺末笔)

又绍兴二十年御书院中人写的行书《千字文》一本，刻入《三希堂帖》，误题为宋高宗，原迹有影印本。其中改字最多，列举如下：

玄(改作「元」)召(吕)让(逊)殷(商)

树(竹)贞(清)竟(罄)桓(齐)匡(辅)

恒(泰)纨(团)丸(弹)朗(晃)

只有「敬」、「竟」二字找不出合适的仄声字来代替，就用缺笔办法了之，可谓「技穷」了。

还有智永写本中「温清」的「清」字写成三点水旁作「清」，与《曲礼》的「清」字不合。按北魏正光年间的《张猛龙碑》「温清」的「清」字也作「清」，可见南北朝时，「温清」一词，还是写「清」读「清」，比唐碑和宋板《礼记》作「清」的早的多！

余谈

上文曾提到故事愈传愈热闹，枝叶由少而多的事，来说明周兴嗣编撰《千字文》，智永书写《千字文》的事也不例外。有趣的是捏造故事的人，有时只顾热闹，却忘了事实上的不合理。例如为了说明智永临书功夫的深厚，便说他用了多少枝笔。古人毛笔是活笔头，可以换头不换管。何延之说他「所退笔头(用秃了换下来的笔头)，置之大竹麓，麓受一石，而五麓皆满。凡三十年……」。到了韦绚的《刘宾客嘉话录》，则说他积年学书，后有笔头十瓮，每瓮皆数万。清代章学诚《知非日札》说：「永师学书虽勤，断无每日换退数十笔头之理。人生百年，止得三万六千日耳。十瓮笔头，每瓮数万，是必百年之内，每日换数十笔头，岂情理哉！」造谣言、吹大气的韦绚，却没想到一千一百多年后还有人跟他算账！

这篇稿写完了，拿着向一位朋友请教。这位朋友看完了，轻松地一笑。我急忙问他笑在何处，他说：

「你费了许多无用之力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『快然自足』无论唐摹本、宋刻本，都是『快然』，『快』字从『心』从『央』，而世行一般古文读本中却都作『快（快乐的快）然』。『快然』二字在唐宋以来文章中不常用，『快然』则普遍流行，易懂常用，其中并无足深求的。『律召』成为『律吕』，恐怕也只是由于常见易懂罢了。《千字文》是以蒙书的身分被传习的，教蒙书的人，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为多，因此『快然』、『律吕』，就都流行起来。你的详考，岂不是『可怜无补费精神』吗？」我心悦诚服地上了一堂「常识」课，赶紧把这个看法写入稿内。

总之，现行这卷以「天地玄黄」为首句的《千字文》，是梁武帝敕令周兴嗣撰作的；所称「次韵」，不知是否次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韵。当时曾用王羲之写过的字集摹一卷，中间有借「玮」为「炜」的字，也有重文异体的字。智永曾对着这种集字本临写过八百多本。日本《献物账》从书法角度说，称它为「拓王羲之千字文」，史书经籍等志从文章角度说，称它为「周兴嗣撰千字文」。

千

集韻

字

文

勅旨外散騎侍郎
周興嗣次韵

天

地

玄

黃

辰

日

宇

宿

月

宙

列

盈

洪

張

昊

荒

閏

秋

寒

餘

收

來

成

冬

暑

歲

藏

往

津

器

颶

呂

騰

結

調

致

為

陽

雨

霜

𩚑

王

金

彌

山

生

巨

岷

麗

關

岡

水